

# 凯梅尔·托卡耶夫：战士与作家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凯梅尔·托卡耶夫和他的部分作品

哈萨克斯坦作家凯梅尔·托卡耶夫由一个孤儿成为一名战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他的哥哥，成为他毕生内心的伤痛。他自己也奔赴战场浴血奋战，身负重伤辗转于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这一切，成为了他人生财富。在战争结束，考取大学深造，并在媒体工作后，他的创作欲望迸发了。于是，他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三次受到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文学嘉奖(他还被授予卫国战争奖章等一系列的勋章奖章)，并成为哈萨克斯坦侦探文学奠基人，被读者迄今追捧。

凯梅尔·托卡耶夫有战士的品格，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困难和险境。他以他的磊落和坦诚，面对题材选择，面对历史，丝毫没有退缩。童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士兵上了前线》，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命运多舛的童年生活。他们从哈萨克斯坦的家乡哲特苏卡拉塔勒逃荒到吉尔吉斯。那天清晨，他和他的哥哥出门去找寻父亲，却意想不到路遇搜

寻队的马车，搜寻队为了完成搜寻孤儿指标，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收进孤儿院。那时的孤儿院条件十分简陋，没有床铺，没有枕头被褥，只铺着一块大白毡，每个孤儿只能和衣躺在大白毡上过夜。虽说如此，但也要有相对确定的铺位，凯梅尔·托卡耶夫的铺位靠近窗口，阳光从玻璃窗口照射进来，令他十分喜悦，柔和的光线投射在他孱弱的身上，让他感到暖洋洋的，从而获得某种滋养和力量。

当来年春天降临，大地换上绿装时，他的哥哥去伏龙芝(比什凯克)打探他们的父母生死存亡信息，终于从接纳他们一家的俄罗斯人雅科夫那里获得确切的信息。他们年幼的妹妹，是在他们躺在病榻上的母亲面前，掉进灶火被活活烧死，母亲也因此撒手人寰。他们的父亲，苦苦搜寻他们兄弟两个未果，也舍家出走不知下落，有人说可能掉进河里被河水冲没。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孤儿。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所经历的童年不幸，正是那个大集体化悲惨岁月的真实写照。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那场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引发了大饥荒，仅夺走了200多万哈萨克人的生命。

而作为一位作家，凯梅尔·托卡耶夫勇敢地面对这一历史，透过他的作品折射出来。也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获得了生命力。他通过作品说出哈萨克斯坦实行集体化运动的后果和实情，同时也揭开了战争秘密的帷幕，真实反映了苏军与法西斯分子的战争，而不避遮掩。显然，卫国战争和以往历次战争一样，有英勇无畏，也有胆怯懦弱；有指挥官的英勇指挥，也有最愚蠢的决定；有进攻，也有败退；有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也有失败主义的灰心丧

气。这一切在他的作品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真实可信。只有亲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才能写出如此切身体验的真实记忆。当然，他还要谨慎面对意识形态陷阱。这一切更加凸显了作家的艺术手段和高超的创造力，印证了艺术的本质是真实这一特性。

凯梅尔·托卡耶夫通过他的作品伸张正义和人的尊严，张扬“尊严高于生命”理念。在面临生与死的战火面前，选择的是要守住人的尊严。“尊严高于生命”这句哈萨克格言掷地有声，它战胜了人性中通常所具有的恐惧感，同时对懦弱和胆怯也体现了一种高贵的包容。作者在他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中也是在呼唤后代的团结、兄弟间的和睦，继承和弘扬哈萨克传统文化，对那些背离传统文化、祸起萧墙、亲人反目、世风日下的行为予以鞭挞。

有趣的是，我们从凯梅尔·托卡耶夫的作品中体验到了第三种学习语言的方式——从战争中学习(第一种是儿童时期在多民族孩子相互游戏中学习，第二种是学院教育学习)，他自己的俄语就是在战争期间学习提高的。

凯梅尔·托卡耶夫亲历了前苏联的四个历史阶段：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部分，没能见到哈萨克斯坦走向独立，更没有目睹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有学者认为，前苏联的瓦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但是他确信哈萨克斯坦终归会走向独立。他的这一信念已经实现。

凯梅尔·托卡耶夫作品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士兵上了前线》，长篇小说《最后一击》《离巢而去的鸟》，中篇小说《夜半枪声》《洪流》《暗算》《发生在萨尔哈班的事件》《迁徙者在哪儿落脚》《山间回声》，短篇小说《绝迹》《在战士墓前》，儿童文学《星际征程》，札记《同代人的秘密——记者笔记》，话剧剧本《红色指挥》《谁是罪犯》《谜团》等卷帙浩繁的作品，相信会和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共存，并激励新一代人成长。这也是对他百岁诞辰的最佳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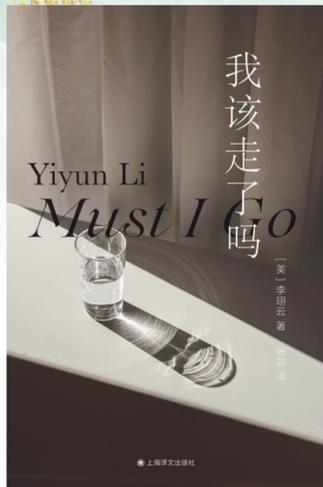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 李翊云《我该走了吗》：拥抱悲痛的练习

□唐艺静



李翊云



《我该走了吗》,李翊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

在美国文坛中，华裔作家李翊云无疑是一位有目共赏的作家。其作品丰富深刻，包揽无数奖项，广受称赞。此前，这样一位备受关注的作家一直坚持用英文写作，并拒绝将作品译回中文，直至译作《我该走了吗》于2023年在中国出版。继《理性终结之处》后，这是她的又一部写于长子文森特去世后的长篇小说。在承袭了李翊云一贯深邃、精妙、严密的语言风格的同时，小说还从字里行间泄露了主人公的真实情感——无论对于小说主人公，还是作者而言，都伴随其一生的悲痛。

翻开书本的扉页，我们看到上面写着“献给……始终、永远的文森特”。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莉莉亚在85岁时开始为故人罗兰的日记作注。她与罗兰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并有了女儿露西。她向罗兰隐瞒了露西的身份，与吉尔伯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一切本应顺风顺水，然而露西在27岁的年纪选择投水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凯瑟琳。为了寻找露西轻生的原因，莉莉亚决定从罗兰的日记着手，寻找这对父女共同的精神内核。小说共分为三部，前两部交织着莉莉亚的现实生活和过往的回忆，第三部是莉莉亚对罗兰日记的正式作注，每个日记的选段后都有莉莉亚的标注，“日记-标注”的结构从中反复出现，他人的声音、罗兰的声音和莉莉亚自己的声音交错在一处，或来自过去，或来自未来，如同一支配合默契的交响乐，互为衬托，互为补充，互为纠正，为整部小说提供了奇妙的复调。

如果说《理性终结之处》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如何直面爱子自杀的悲剧，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我该走了吗》则是一次对悲剧的哀悼、溯源。最终人们该如何背负着悲剧自我重塑?不少人把它当作女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因莉莉亚和罗兰与“我”和作家R的感情轨迹何其相似，丧子之痛又何其悲切，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罗兰的日记，甚至罗兰自己都并非小说的关键。莉莉亚难以否定，“如果我们未孕育出一个女儿，我也不会把罗兰忘了?”她作注并非出于对罗兰的一片痴心，而是她的女儿莫莉向她抛出的问题：“露西的死是合情合理的吗?”在遭到莫莉的质问之后，她终于发现，尽管自己对露西的成长格外关照，但她从未弄清露西轻生的原因。罗兰的日记是莉莉亚追忆往事的媒介，罗兰本身是莉莉亚探索露西轻生之谜所需的范本，正因露西与罗兰在血脉上的相似，莉莉亚只能通过他的过去解开心结。不过，罗兰的日记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即罗兰心目中的自己和其他人。日记中的罗兰不像莉莉亚记忆中的那样通达，他敏感、多情、志大才疏，因伊舅妈和西德尔困惑，甚至自嘲“认识西德尔之后，我没有一天长大”，他对过去不由自主的美化难以得到莉莉亚的认同，让莉莉亚发出了和罗兰相似的感慨：“人会在自己的日记里说谎吗?”日记的叙述者并不可靠，日记之外的叙述者自然难逃相同的质疑，让人不由得猜想莉莉亚是否也像她自陈的那般铁石心肠。

莉莉亚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我”存在本质的不同——莉莉亚从不耽于外物而失去自我，因而从未失控。她认为自己的家族是拓荒出身，铁石心肠是刻在移民和拓荒者基因里的特质。“我的爱和我这个人一样硬……只要我能做的事，我倾尽全力去做，但我不与暴风雨、洪水、地震作斗争，我不哄自己相信我能不我自己……只有软弱的人才从他人身上寻求回报，我们的回报是我们自己。”从疗养院其他老人和莉莉亚自己的子女口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莉莉亚是个刻薄、不友好、欺凌他们、不讨人喜欢的老人，莉莉亚评价自己敏感而自私，这样的人仿佛情感迟钝，永远不会陷入失落中难以自拔。但莉莉亚的悲伤有迹可循，她仅通过文字就能与西德尔取得共鸣：“西德尔需要那份铁石心肠，否则怎么能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活下去?”不管哪个母亲，忍住的泪水都不会多于她，但莉莉亚拒绝流泪，她“是那种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尽量实现最大作为的人”。事实如此，她是个对他人和对自我都格外严厉的人。尽管她将度过的每一天视作对露西放弃生命的拒绝，尽管她日夜思索希望露西以何种身份活下去，她仍不表露悲伤。她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配合着每一任丈夫的生活，同时保持自我的清醒与独立，她不算是家庭中的奉献者，因为处理琐事不妨碍她从中取乐，游手好闲。

但情感的忍耐和遏制最终会造成耐受甚至麻木。莉莉亚最终似乎耗尽了她的宣泄情感的机会——“不哭对一个人产生奇特的影响好比用一

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有一天，你对自己说，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坝说，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坝顶。对呀，什么水?另一边是一片沙漠。”她并非因铁石心肠才不为女儿落泪，而是为了不被悲伤压垮而不得不铁石心肠。这是一层穿上便与人的血肉结合的盔甲，让莉莉亚看上去不近人情，却在三十七年后仍放不下露西的死，并选择通过这份日记将对生活的理解传授给凯瑟琳和约拉，因为她们是露西唯一的后人。

这份精神的韧性支撑她度过长达37年的悼念与抗争，以至于她在面对“幸运”与“不幸”时也平静地一视同仁。她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带有宿命论的色彩——露西的死算不得悲剧，“假如把人生过得和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那样算很不幸吗?选择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死法也算吗?”吉尔伯特因露西之死而悲伤时，她也说：“没有法律禁止灾难降临在你头上。反过来，也没有法律禁止幸福落到你头上。换一个当母亲的，处于我的境地，也许会因一个孩子的死而恸哭：为什么是我?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我?”生活不公平地让一部分人遭受痛苦，但公平地不去挑选遭受痛苦的人。在莉莉亚看来，悲剧总会降临，但悲剧不源于任何人的决定。“伤我们的只有生活，我们不向生活报复，因为我们不为报复而活。”

从这个角度看，莉莉亚也是作者李翊云的一种折射，宿命论的论调充满了李翊云的人生，李翊云也如莉莉亚一般习惯隐藏自我，和莉莉亚对露西之死的纠结相同，李翊云也一面在播客中说：“我的大儿子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不躲藏。”一面在书中怀念文森特：“你要在就好了，没有你，房子里空荡荡的。”

这源自李翊云不美满的原生家庭。母亲是家庭的“暴君”，而父亲是母亲责骂的对象。“面对骄纵跋扈的妻子，他的应对方式永远是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他没有保护李翊云姐妹免受母亲的伤害，只是告诉女儿，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只能逆来顺受。因此，李翊云只能靠自己逃避母亲的控制，写作也许是她唯一的途径。母亲不懂英文，她便开始用英文写日记，防止母亲偷看。不用母语写作、不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都源于幼时被母亲偷看日记的心理创伤。李翊云素来以冷静的笔触著称，但年少时的经历依然让她养成了向家人隐藏自己的习惯。莉莉亚丧女之后的心理活动也许正与李翊云失去长子后的思绪相应和，莉莉亚长年与悲伤为伴，武装并重构自我的过程也是李翊云正视自己的家庭悲剧的过程。小说其实是对生活的折射，莉莉亚的絮语也是作者的絮语。它几乎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波折，但却有坚韧的骨架，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

莉莉亚试图在日记中寻找答案，露西和罗兰的确相像，她也仿佛从西德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罗兰与西德尔的关系相较于情人，更类似母子。罗兰得不到西德尔的全部关注，但西德尔却用自己的思想构筑了罗兰此人。同样地，露西在莉莉亚的影响下长大，但我们只能从莉莉亚口中得知，她对露西格外关照，而露西是否从莉莉亚身上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已然无从可寻。罗兰与西德尔、露西与莉莉亚，二者构成对应，但死者必定不能对照日记中的生者。最终，莉莉亚没能找出答案，李翊云也许也找不到文森特轻生的原因，但相较答案本身，直面悲痛并自我恢复的过程要重要得多。

对李翊云而言，《我该走了吗》是对生活的摹写，对悲痛的接纳。莉莉亚与悲痛为伍多年，坚韧的思想是她的武器，但悲痛不是敌人，不一定必须摆脱。正如李翊云本人所言：“我拒绝和解，但我接受现实。”她对简单的出路不感兴趣，安宁本身即是陈词滥调。比起抛弃悲痛，构筑更坚强的自我，让自己不再对悲痛抱有恐惧，才是更有勇气的做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动态

# 文学是最美好的交流

□杨红昆

6月7日，中国老挝作家文学交流座谈会在昆明召开。座谈会由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主办，老挝作协主席通拜先生一行5位作家和十余位云南作家参加座谈会。

这是又一次中老文学活动。我退休后，原以为很难再见到30年前就结识的老挝作家朋友们，但《一路情长》这部书的出版，又一次让我们欢聚在一起。

去年应云南省委宣传部的聘请，我参与了《一路情长》这部书的出版扶持审读，再次读到了通拜先生与众多老挝作家热情洋溢的作品。

我曾在老挝参加澜湄六国文学交流活动，开阔的澜沧江、湄公河水波浩荡，两岸的雨林密密丛丛，顿生与世隔绝的幻觉。在不同国家作家代表的惊叹声中，我眼前幻化出6个国家优美的文字在水波中闪烁，在湄公河的沐浴下文采四射……

2016年3月，在海南三亚，中国与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六国领导人，拿着盛有澜湄江水的竹筒，将水注入启动台水槽内，随即六水合一。这一象征“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仪式，宣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也宣告了中老铁路建设的启动。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道路”来进行的。在汉语中，“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包含着对道理的认识和道义的坚守；“路”则非常具体，表示指向和通往。“道”是途径和方式。其中一条著名的“道路”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展现出来的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不同国家和地区敞开怀抱欢迎和平友好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中华文明也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感受并学习到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共同谱写了多种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篇章。在今天的东南亚，这条“道路”亦是澜沧江—湄公河，是中曼大通道，是崭新的中老铁路。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途径很多，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昆明到万象，文学无疑是美好的交流方式之一。

全长1035公里，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更是连接沿线百姓的民心工程。它改写了老挝没有标准轨铁路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西双版纳不通火车的历史，让两国的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湄公河流域五国是中国的邻居，与我们山连山水连水。云南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澜湄六国大地山川多样，民族文化多元，无论地理还是人文，都可谓异彩纷呈，通过多种多样的文学艺术活动，能多角度了解彼此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并以此为契机，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和了

解，从而建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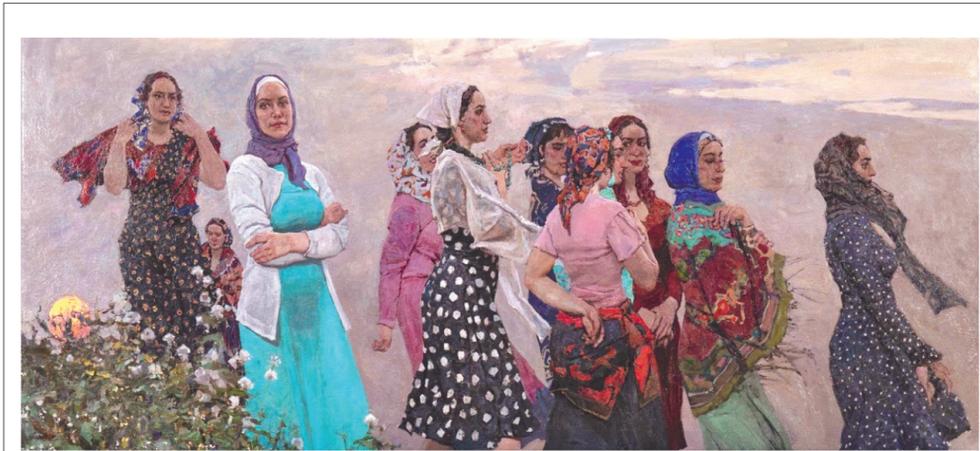
因为澜湄文学，众多云南作家曾多次走进澜湄各国，他们在亚洲第一高桥驻足，在野象谷观象，在琅勃拉邦的湄公河上漂流，在清静学到了“萨瓦的卡普”，在湄赛感受金三角神秘，在素可泰领略泰国的古老，在柬埔寨看到吴哥的微笑，在越南下龙湾感受海上石林的风光，在缅甸蒲甘看万塔之城……

文学的交流无国界，艺术的交流更没有障碍，在这一点上，人类可以说息息相通。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世间万物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写作者在纸面上经历风霜雨雪，感受四季轮回，唯真情与爱永恒长久。

在不同的地区与国家，写作与阅读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的存在为生活增添亮光与色彩，如天上流动的白云、地上绽放的鲜花、草原漫步的骏马，自然而本真地存在着，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却能内心相依相通，因为我们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爱与纯真，美好与希望。

中老铁路是一条多姿多彩、流淌着文学梦想的道路，是一条承载着两国人民幸福和未来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创造活力的道路，是一条滋养伟大文明并奔流不息、永远年轻的道路。

(作者系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哈萨克斯坦画家达乌德·阿赫列耶夫绘画作品 SHUJIE WENTAN